

中國傳統禮治

ZHONG GUO CHUANG TUONG LI ZHI



林中堅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林中坚 著

中國傳統禮法

陳紹基題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礼治/林中坚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 - 7 - 218 - 05337 - 8

I. 中… II. 林… III. 礼治—研究—中国
IV. 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7646 号

责任编辑	余正平
美术编辑	周嘉敏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337 - 8
定 价	2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直销)】

作者简介



林中坚，男，广东雷州人，哲学博士，1958年出生，1983年毕业于广东海洋大学农学系，1996年获中山大学世界经济硕士学位，200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3年后任遂溪县黄略区公所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1984年后任中共遂溪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1986年任湛江市团市委副书记；1987年后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农工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广州市青少年教育办公室主任；1991年后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学校部部长、广东省学联秘书长；1996年后任中共广州市芳村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2003年后任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2005年后任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2006年后任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副书记。

内 容 摘 要

中国传统以礼治国的真正实施是从西汉开始的。追溯历史，秦亡汉兴，百废待举，统治者、思想家们都在认真总结秦朝速亡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在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去治理国家和社会，才能使国家和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是继续实行以法治国，还是实行以道治国或以礼治国？这一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过程，就是西汉以礼治国思想逐渐形成的过程。

西汉是对先秦礼治思想扬弃、融合，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新、定型的时期。汉初，道、法、儒等不同学派思想斗争、相互渗透空前活跃，经过交融、创立、完善的三个阶段，先后实现了新道家“道治”与“德治”的渗透、新法家“法治”与“礼治”的融合，逐渐发展新道家尊道重德的礼治思想和新法家依礼行法的礼治思想。董仲舒等新儒家总结、继承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吸收、整合新道家、新法家、阴阳家等理论成果，创立西汉新儒家礼主法辅这一新的礼治思想体系，使“以礼治国”思想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戴圣《礼记》的形成，促进了礼治理论的规范和成熟，影响中国封建社会2000年。传统礼治思想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汉思想统一的过程，是新兴统治阶级营造新的上层建筑，探索治

国安邦统治模式的过程。西汉礼治思想是先秦礼治思想的创新发展。西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实行以礼治国的开始，是中国礼文化从先秦古礼发展为西汉新礼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学化的启动时期。

本书以以礼治国为主线，对西汉礼治思想的渊源、发展阶段和特点，西汉有关思想家、礼学家及重点著作进行研究，重点论述了西汉礼治与法治、道治、德治、孝治、文治的关系，以及礼治思想中的礼义、礼仪、礼乐、礼制等范畴，阐释了关于中国传统礼治思想形成的一得之见，以及对于今天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

汉代礼治的形成及其思想特征

——林中坚《中国传统礼治》序言

李宗桂

自西汉到清末，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礼为标榜、以礼治为旗帜的社会。

礼是什么？是制度，是规范，是习俗。什么是礼治？按照习惯性的或者约定俗成的看法，就是用礼去治，根据礼的原则和价值去治理天下。礼治，是一种治国方略，一种政治价值取向，一种和谐社会理想，一种有序的社会状况。从学理的层面看，礼治包括礼学、礼仪；换言之，包括礼治理论和礼治制度，而后者更多地体现在实践方面。

从汉到清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治，其观念、制度、规范等层面的建构，主要是在汉代形成的。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传统礼治，形成于汉代。

汉代礼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全新的价值系统，其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宏观地看，整个两汉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礼治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孕育阶段——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西汉前期）；确立阶段——从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宣帝时期石渠阁会议和《礼记》的定稿及其流行（西汉中期）；成熟阶段——东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及《白虎通义》的出现。其间，官吏选拔制度和其他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伴随其中。限于篇幅和论述的重心，这里主要从礼治思想的层面论说问题。

一、礼治孕育阶段：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西汉前期）

西汉高祖立国以后，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所做的工作，属于礼治初创阶段。

草莽出身的刘邦，最初并没有认识到儒学对于巩固统治者利益的作用，并不懂得儒学的守成价值。经过儒生们的开导，他才真正明白了其间的道理。根据史书记载，陆贾针对高祖不喜儒学的毛病，“时时前说称《诗》、《书》”，被高祖痛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居然大胆对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居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①高祖和陆贾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儒学的守成功能的问题；大而言之，是如何看待礼治的功能问题。好在高祖有点文化自觉的意识，尽管面对陆贾的诘难有点不高兴，但仍然要其著书阐明秦亡汉兴的道理，以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于是，“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②陆贾《新语》新在什么地方？从总体上看，

^①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② 同上。

就是新在针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了尚德行仁的治国方略，认为“天道不改而人道易”。国家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行仁义，法先圣”，“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① 仁义之治，当然是礼治。陆贾所倡导的礼治，主要是指治国方略，同时也涵摄着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陆贾强调“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不少论者认为这是陆贾思想中儒道兼综或者儒法并用的表现，其实，这是儒家思想自先秦荀子以来形态更新的必然结果，是儒家思想的本质表现。在荀子那里，既隆礼，又重法，但法从属于礼，礼统率着法。荀子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②，便是明证。荀子既认为“法者，治之端也”^③，更强调“礼”是“强国之本”^④、“人道之极”^⑤、“国之命在礼”^⑥。这些，说明作为战国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实际上主张治国之道在于文武并用。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贾文武并用、董仲舒德主刑辅、汉宣帝“霸王道杂之”思想的发展逻辑，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儒家礼治的某种特质。

贾谊进一步推进了礼治的思想。他认为，国家的安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气乐；驱之以

①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② 《荀子·劝学》。

③ 《荀子·君道》。

④ 《荀子·议兵》。

⑤ 《荀子·礼论》。

⑥ 《荀子·天论》。

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① 这是在治国方略上十分清楚地提倡礼治。在制度建设层面，贾谊主张“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还运用五行学说，倡导汉朝“色尚黄，数用六”，论证汉朝是按照五行生胜原则，承“运”而出。为了统治秩序的安稳，他在其著名的《治安策》中，利用秦朝暴亡的惨痛教训，极力倡导礼治。他说：“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人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在贾谊看来，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弘扬礼、义、廉、耻，不施仁义，不行礼治。因此，他要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贾谊的这些思想，是汉代礼治发展的重要环节。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看，贾谊的礼治思想，主要还是承袭了孔孟，但同时也引进了阴阳理论。而由于阴阳理论的掺入，就在客观上开辟了最终走向谶纬神学、形成宗教信仰的可能，这在后来的董仲舒思想特别是谶纬思想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说，陆贾和贾谊是在思想理论的层面做礼治建设工作的话，那么，叔孙通则是在制度的层面做了更多的贡献。

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为刘邦稳定天下、认识礼仪的价值做了重要贡献。在刘邦登基后，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② 明确指出儒学对于国家社会的功能在于“守成”。他对刘邦表白：“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③ 他指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他愿意

① 《汉书·贾谊传》。

② 《汉书·叔孙通传》。

③ 同上。

“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①也就是说，叔孙通所要为刘邦制定的朝仪，既有古礼，也有秦礼，是二者的综合创新。叔孙通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采纳：“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②。经过一番努力，叔孙通和其所征的儒生及其他热衷制礼者所制定的朝仪得到刘邦的首肯。在长乐宫建成的那年，诸侯群臣举行朝拜大礼。在庄严的气氛中，“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③。刘邦去世，惠帝继位后，让叔孙通“定宗庙仪法”，“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④。可见，叔孙通对于刘汉王朝礼治的开启，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叔孙通在汉初所制定的各种仪法，奠定了汉代礼治制度化的基础。

与思想家们的基调一致，西汉前期的最高统治者们也认识到了礼治的价值，从而使礼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班固在《汉书》叔孙通传末尾评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班固这个结论，过去人们并不在意，今天看来，是颇有深意，也颇有见地的。高祖刘邦靠军事暴力夺得天下，儒生们则依靠自己的智慧，阐发儒学的守成价值，说服高祖实行礼治。通过刘邦之类的政治家运用行政力量，思想家和政治家合作，形成了初步的礼治的局面，所谓“并成大业”，即此之谓也。班固画龙点睛地说：“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表，遇其时也。”何谓“遇其时”？遇到刘邦能够采纳礼治建议之时也！所以，过去长期认为刘邦不重礼

① 《汉书·叔孙通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仪，仅是草莽皇帝的看法，是片面的。

高祖刘邦在天下既定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敖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①。汉文帝在位23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②。班固在《汉书·景帝纪》末尾称赞文景之治说：“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所谓移风易俗，实际上就是改变秦朝的苛政，用儒家的礼义指导政治，使得“黎民醇厚”。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文景之治是西汉礼治的初创成果。

二、礼治确立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 (西汉中期)

西汉中期，是汉代礼治思想的确立阶段。这个时期，是以汉武帝和董仲舒为代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协力创建礼治价值系统的时期。正是他们的建树，使得礼治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治国方略，由先秦孔、孟、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

武帝即位以后，对于礼治的建设是逐渐推进的。即位当年（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他即下诏令各级官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但同时采纳了丞相王绾的建议，罢黜“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以免“乱国政”。^③这是汉代立国以来，最高统治者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第一次明确取缔法家和纵横家思想。这里透露出的思想趣味，是要采用与法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汉书·武帝纪》。

家严刑峻法之治和纵横家以游说辩说为特征的相反的思想理论。显然，这是为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登台开辟道路。就在同年，武帝又“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①。建元六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年），先是“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进而下诏贤良，要求他们提供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方略，并且“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在这种情势下，“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②！这就是说，武帝即位不久，很快就在为全面实行礼治寻找方略。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的出现，把儒家礼治思想提供给武帝，而武帝又通过行政的力量，使得儒家礼治理想成为汉代社会的现实，并开辟了此后封建礼治的道路，为其奠定了基本的模式。除了前文引述的材料外，我们从《汉书·武帝纪》中还可看到很多相关的记载。

元朔元年（前128年），汉武帝下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③。臣下奏议曰：“不举贤，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对此，史书记载“奏可”。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又下诏，强调“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同时指出，“今礼坏乐崩”，故需“令礼官劝学，讲义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同上。

③ 同上。

先。”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得到武帝批准，此后“学者益广”^①。元狩六年（前117年），武帝在诏书中曰：“仁行而从善，义立而俗移”。元鼎二年（前115年），武帝又在其诏书中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元封元年（前110年），又在其诏书中表白：“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这类重视礼义，倡导孝廉，力图确立礼治的思想，在武帝本纪（特别是武帝的诏书）中，比比皆是。这和汉朝立国以后从高祖到文、景时期的境况，已经迥然不同！考诸史实，正如班固在《汉书·武帝纪》末尾的赞语中所说：“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②。应当说，班固这个评说是准确的。正是武帝的这种文治之功，最终使汉代礼治得以确立。

武帝以后，昭、宣二帝继承了武帝以礼治国的思路。与武帝在位半个多世纪（54年）的悠长时期不同，昭帝在位仅13年，建树不大。尽管如此，昭帝仍然为保宗庙而在诏书中说自己“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③。有趣的是，从《汉书·昭帝纪》看，昭帝有若干诏书，但直接谈论礼学或者涉及礼治的，仅有始元五年（前82年）的诏书。这除了因为昭帝在位时间短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形势十分严峻。而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同上。

③ 《汉书·昭帝纪》。

昭帝幼年（9岁）即位，大将军霍光辅政，面对经济凋敝的严峻形势，“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①。恢复经济，疏解民困是当时第一要务，自然谈不上什么礼治的建设。但在昭帝登基八年左右的始元、元凤之际（前80年前后），“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经济逐渐恢复以后，还是实行了“举贤良、文学”的先王（武帝）之政。这种举措，是西汉礼治确立时期的顺天应人之举。其实，昭帝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施政纲领，是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贯彻了其前辈（文景）的礼治思想，与武帝和后来的宣帝等在礼治理论及其制度建构方面的努力，互为表里。

值得重视的，是继昭帝而出的宣帝。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霍光在奏议中指出，刘询“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②。这个奏议被认可。不久，刘询便即皇帝位，这就是汉宣帝。从霍光的奏议可以看出，刘询能够被推举继承皇位，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儒家礼治思想的熏陶，具有儒家所希望的“慈仁爱人”的帝王风范。正是由于宣帝浸淫于儒学礼治的氛围之中，深切认识到儒学的守成作用，所以，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礼治，甚至以九五之尊参与学术讨论，并亲自裁决学术争论。从《汉书·宣帝纪》的记载来看，宣帝在诏书中关于儒学、礼治的议论甚多。在其即位的第二年即本始二年（前72年），他在诏书中盛赞武帝的武功的同时，充分表达了对武帝的文治之功的仰慕：“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

① 《汉书·昭帝纪》。

② 同上。

德茂盛，不能尽宣……”。本始四年（前70年），在关于地震的诏书中，要求“博问经学之士”出来辅助政治，并“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①地节三年（前67年），又在关于地震的诏书中要求：“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宣帝还表示，自己“不能附远”，是因为自己“不德”。同年，还曾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以亲百姓”，并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惟恐“羞先帝圣德”。^②地节四年（前66年），宣帝在诏书中说：“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元康元年（前65年），又在诏书中说：“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这当然可能是矫饰，但六艺、大道成了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动因，毕竟说明儒家礼治成了宣帝治国的重心。而况，武帝要“导民以礼”，宣帝则要“导民以孝”。礼，当然包括孝；孝，自然是礼的表现。可见武帝、宣帝之间，其思想真正是一脉相承！元康三年（前63年），宣帝在诏书中说自己早年曾在张贺的辅导下“修文学经术”。甘露二年（前52年），宣帝召集臣下讨论匈奴朝贺的事宜。臣下对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宣帝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③这些情况表明，宣帝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即位后坚持用儒家思想治国，为礼治的实现做了努力。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宣帝在位期间值得重视并且影响深远的有两件事。一是出席石渠阁会议，参与经学问题的讨论，并亲自裁决是非。二是关于治国之道的那段“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宣言。

① 《汉书·昭帝纪》。

② 同上。

③ 《汉书·宣帝纪》。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①。这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石渠阁会议。史料表明，武帝即位不久，即大力表彰儒学，设立五经博士，令其讲授儒学经典。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大盛。但经学有不同派别，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并存，齐学鲁学同在；有的立为学官，有的未列学官；经学内部意见分歧，各自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宣帝为了评判经学内部的是非，统一认识，在石渠阁召开了经学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大都是今文经学家，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今文经学家内部辩论五经异同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焦点，是《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的异同。宣帝喜好《谷梁》，在这个名为“平公羊、谷梁同异”^②的会议上，以公羊博士严彭祖等人为一方，以《谷梁》派学者尹更始、刘向等为一方，相互论辩。最终谷梁派取得胜利，“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③，“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谷梁春秋》从此列为官学。公羊学是齐学，谷梁学是鲁学，这次会议，以鲁学的胜利而告终，从此齐、鲁并立。我们知道，武帝用董仲舒，立《公羊春秋》为学官，从此公羊学大盛；而宣帝自己喜好《谷梁春秋》，利用石渠阁会议，在“稽古礼文”的背景下，立《谷梁春秋》为学官，此后谷梁学大盛。这当然可以看作是皇帝个人爱好使然。值得注意的是，从武帝尊《公羊》，到宣帝尊《谷梁》，反映出统治者在实行礼治的时候，在思想文化方面走的是一条逐渐宽广的道路，奉行的是一统政治下的多元文化取向。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武帝和宣帝都是以

① 《汉书·宣帝纪》。

② 《汉书·儒林传》。

③ 《汉书·宣帝纪》。